

# 谁是苏共亡政的罪魁祸首

尤德才

2013-05-06 10:32

共识网最近登载几篇有关《旧制度与大革命》研究文章。如周舵：再读《旧制度与大革命》；闵良臣：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三题等文。虽没有全看，但感觉改革需要共识、智慧和妥协。个人有些看法，请大家多多指教。

有感九：谁是苏共亡政的罪魁祸首

近 20 年来，对苏联解体、苏共亡政、东欧剧变的研究汗牛充栋。有体制弊端说、改革失败说、蜕化变质说、精英叛变说、党群疏离说、腐败亡党说、“斯大林”说、和平演变说、民族矛盾说、军备竞赛说、舆论失控说、“三大垄断”说、戈氏葬送、意识形态衰落说、社会主义阵营分裂说、民主缺失说、乌托邦说、病态早产说，等等。

长期以来，许多中国人将苏联解体归咎戈尔巴乔夫，引起共鸣似乎最强烈。2011 年 3 月 1 日，中国社科院（CASS）发布了一本新书，居安思危：苏联亡党二十年的思考。得出结论是，苏共垮台的根本原因不是俄罗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而是由当时的总统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俄罗斯共产党的腐败。其观点值得商榷。

2012 年 5 月 3 日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向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颁发圣徒安德烈佩尔沃兹万内勋章，是俄罗斯帝国的最高奖赏。将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归咎戈尔巴乔夫，不光俄罗斯，整个前苏联的民众都不会赞同。即使苏共自己也不敢把苏共垮台归咎戈尔巴乔夫，俄罗斯共产党书记久加诺夫对苏联解体、苏共失去统治地位反思的结果是：一党专政，三大垄断(垄断政治、垄断经济、垄断真理)。苏联解体、苏共亡政及东欧各国社会主义崩塌深层次原因到底是什么？

本人认为，庞大苏联帝国顷刻崩塌、苏共亡政、东欧巨变的主要原因：一是思想意识问题，二是体制问题。违反事物发展规律必将自我毁灭。

法国大革命不是一天突然发生的，早在路易十四已种下祸根。克维尔全书的主旨在于告诉我们“路易十四的中央集权制度已经使得法国革命不可避免”。长期的专制，法国自古以来的政治自由传统就逐渐被破坏，王权专制到登峰造极自称“朕即国家”的“太阳王”路易十四。逐步构建以从上到下的中央集权和官僚体制，剥夺了国民的政治自由。长期的专制，必然腐败低效，贵族官员滥用权力，不作为、乱作为；国王更是不受任何约束，带头滥用权力，干预司法，社会缺乏公平公正，社会的不满情绪不断在积累中。

路易十六是位较为开明的国王，深知道不改革没有出路，为释放长期积聚的不公平所导致不满情绪，不断努力改善来满足大众的期望。例如，巴士底狱没有政治犯，如果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时期关进去的政治犯，到路易十六也大都被释放（除精神病患者）；当时的法国农民的自由、平等和财产，比路易十四、路易十五都受到更好的保护。但长期忍受不公平待遇的法国人民，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人民对社会政治的需求和期望不断增长，思想观念深刻变化，需求也越来越高。人民从满足温饱的需要，提高到人权、受尊重、平等、自由等等的需求等。一旦压迫减轻，就会尽其力将其挣脱，对特权、腐败、不平等、公正的容忍度越来越低，对特权越来越敏感。此时，路易十六稍有差错，似乎都比路易十四（名言：朕即国家）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最终，路易十六也蒙难于革命的断头台。

苏联国家和苏联共产党的创立者列宁，创建了俄国共产党（后改称“联共[布]”），开展暴力革命，推翻了沙俄帝制。在“胜者王败者寇”的马克思唯物斗争的思想意识影响下，苏共成为执政党以后，没有实现自身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换。仍然用革命党的意识观念、创立了党政军高度统一、党权高于一切的“党化国家”体制，从而为斯大林模式的建立培育了合适的土壤。不讲科学与民主，唯我独尊，种下苏共亡政，葬送了社会主义苏联及其阵营祸根。

十月革命胜利后（媒体报道，俄罗斯史学界对“十月革命”看法是属于政变性质。今天，这一正确的观点也已写进了学生课本），列宁为确保政权的稳定，全然不顾现代社会政治生活所应当具备人权、民主、法治、珍惜生命的人性思想意识、权力的合法性、决策的程序性、行动的规范性。他亲自发起并由政治局集体决定，将一批知识份子驱逐出境，还镇

压了要求实行自由选举、自由贸易等的客琅施塔得水兵。到 1921 年上半年，任何出版、集会、都被认为是“致人死命的药”和“自杀”的行为，造成全国一片红色恐怖。出尔反尔地对待立宪会议，直至以武力驱散立宪会议，表现出苏共那种藐视法治的恐怖、专制主义倾向。

列宁为了打击异己，列宁和斯大林还创建了古拉格劳改营模式，并在后来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劳改营的典范。从东德的六一七镇压、波兰的波兹南惨案到匈牙利的 1956 年事变；从柬埔寨的大屠杀……等等人间重大悲剧，“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带给各国人民的不是美好的生活，而是绵延不绝的苦难。正如列宁导师普列汉诺夫梭预言的那样：“列宁的理想主义社会将象纸牌搭成的小房子那样坍塌，而且几乎没有人再站出来为此抗争。”苏联如此，东欧如此。历史证明了一切，这一切从开始就是个错误。

列宁把考茨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需要把国家权力机关置于公众的批评之下，用公民的自由组织来制约国家权力，剥夺官僚机构的立法权，把官僚机构置于国会的监督之下。要制服国家政权的绝对权力。”彻底地予以否定。认作是“无产阶级革命叛徒”，是对苏维埃国家的攻击。

列宁针对考茨基的这一命题，反驳说：“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就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后来苏联的历史证实，列宁的反人性、反文明、反民主宪政的思想，在苏联像揉了发酵粉似地膨胀起来。

斯大林模式当然是斯大林构筑的。但错误体制的理论、方针、政策很大程度受到马列思想和遗留制度结构影响、或制约所构建的。集权体制、公有加计划的僵化体制这些现象是在一定的思想体系支配下形成的；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是根据一定的思想体系建立的。人的行为也是被人的思想支配的。正是由于国家政权的权力“不受任何法律约束”，以致苏联宪法规定公民享有的民主权利也被随意剥夺，给苏联人民和民族带来灾难。

斯大林执政期间，迷信“胜者王败者寇”的马列主义唯物斗争哲学。忽视人类社会是一

个充满感情和意识生命，必须对生命和人权的珍视。文明社会是靠用民主宪政、社会公正和道德规范等方法去解决人类社会矛盾等问题。为巩固权力和领导中心，不断进行政治清洗，大规模“肃反”、“清洗”，采取取结盟联合、分化孤立、各个击破、整体清除的方法。先后对苏共领导集团中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等建党元老、开国元勋、政治对手进行大清洗。

同时，固化“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模式和等级授职制的用人体制，从政治局和书记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党员干部队伍中扩充自己的班底，形成了享有宅第权、特供权、特教权、特继权、特卫权、特支权等各种制度化特权和非制度化利益的既得利益阶层。

党政军高度统一、党权高于一切的“党化国家”体制下，就会从社会的经济、政治到意识形态的进行“三垄断”。“三垄断”原话是：“即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经济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和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管理制度。”“所谓垄断真理，实际上是一种对思想的箝制，它的最初表现形态就是宣称：只有党的理论、理想、文件才是真理（进而又发展为凡是党的领导者的思想、言论、指示都是真理），必须无条件绝对服从，它是一切媒体、言论的导向。‘朕即真理’，一切真理都在我手中，我说的就是对的，凡有任何一点怀疑，或不同的看法，就是违反真理，就是‘阶级敌人’，应予以镇压，甚至肉体消灭。”如索尔仁尼琴等不同政见者，就动用专政工具整肃、镇压，或投入监狱，或疯人院，或驱逐出国、剥夺公民权利等等，这就引起一系列灾难性恶果。

苏共从斯大林时期，其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不仅窒息了苏联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而且就逐渐蜕变成一个特权阶级，各种腐败不但没有得到根治，反而愈演愈烈。贪污受贿，官员福利，特供商品，官官相护，司法不公，裙带关系等腐败现象已成常态。高级干部一切家庭生活费用由政府开支，苏联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供应网络，领导干部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把公有财物变成家产，甚至亲属也利用其特殊地位搞豪华生活。普通公民望洋兴叹等种种特供商品。

正如叶利钦所指出：“如果爬上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专门的医院、疗养院、漂亮的餐厅和特制佳肴、不花钱的源源不断的奢侈品、舒适的交通工具等等。因为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暂时二亿人只能为一二十人建立‘真正’的共产主义”。“州委第一书记是个土皇帝，他的旨意就是法律，第一书记想权力谋私是太方便了。几十个人过上了共产主义式的生活，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却在贫困中苦苦挣扎”。共产主义对他们来讲是个好东西，只是不属于人民大众，只属于那帮享有特权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党员干部，他们要权有权、要钱有钱、要枪有枪、要警有警、要颂歌有颂歌，可以提前享受共产主义分配原则——按需分配，从而造成民心丧失。

在高压统治下，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垄断了社会政治权力，使得苏共及其领导人的权力凌驾于政府和法律之上，形成脱离人民的官僚特权阶级；垄断了资源和经济利益，苏共党内形成约 50 到 70 万人、加上家属共 300 万人的特殊利益集团。他们掌握党政军领导机构和企业、农庄领导权。致使官僚支配权演变为隐性占有权，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获取利润。大量资源被用于军事工业，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对苏共的不满日益增加。

特别是在苏联那样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往往会把对既得利益集团腐败专制的不满情绪转化为民族矛盾，一旦累积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就将导致民族动乱、国家分裂。人民敢怒不敢言，只有默默地忍受和祈祷，祈祷这个腐败的政党早日垮台。“苏共‘三垄断’终于把自己葬送了”

斯大林之后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尽管拥有推进改革、提振民心、走上民主宪政的最佳机遇和条件。但他们“胜者王败者寇”的马列唯物斗争的根深蒂固的思想意识，体制的受益者和守成者，打天下是为了得天下，坐天下守天下，江山永不变思维下。要么禁止改革，要么改革不彻底，放弃改革，固步自封、不思进取，自欺欺人的精神状态和社会心理，从而将“党化国家”体制不断推向固化和极化的境地。

特别是勃列日涅夫的“维稳主义”执政 18 年间，不仅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反极权、反特权、争民主、争人权、争自由，拒绝改革。反而固化斯大林集权体制而成为官僚主义

体制，造裙带势力严重，重视实际能力和创新能力受到排斥。选拔领导人员不是通过选举、竞争、按能力选拔，造成领导人素质整体下降，产生了大量“勃列日涅夫式”干部，带来人才危机的问题日益突出。苏联晚期的“老人政治”使政坛暮气沉沉。在此期间，苏共党内已逐步形成约 50 到 70 万人、加上家属共 300 万人的特殊利益集团。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获取利润，党员干部的贪污腐败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苏共开始走上腐败变质道路，动摇了苏共执政的社会基础。

他们大多数人主观上并不想搞垮苏联，而是想方设法维持现状，改革被利益集团所绑架。极权制度下，除了权力，谈何信念！勃列日涅夫就曾这样说道：“共产主义不过是欺骗那些无知民众的谎言”。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成为口头上说的东西，更关心自己官运、地位和特权，任人唯亲，排除异己，把权力作为捞取金钱的手段。形成更高度集权的特权官僚制政治体制，党组织行政机构化，党政干部官僚化，形成特权阶层的“党化国家”。越是大拆大建，窃取公共利益越多，民心流失越明显，最终走向帝党和官僚腐败党，使苏共代表性和合法性受到质疑。伴随着权贵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发展壮大，“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苏共赖以执政的民心资源消耗殆尽了。

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腐败。“以党治国，以党代政”的苏式体制，势必加速权力异化，产生特权集团。党再强大也是党，不是国家。社会因权力的过于集中而发生了巨大的扭曲。权力大于良心，权力大于法律，权力大于真理，权力大于民意。官僚们每天为了争权夺利而你死我活地角斗着，再而三错失改革良机，苏共执政的“最大政治优势”变成了“最大的执政危险”。最后病入膏肓，改革已经晚了，任谁都无法改变“亡政”的命运。

正由于苏共成了苏联最大的利益既得者和特权阶级，很多人入党动机不纯，抱着个人私利入党，并非出于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建党之初，确实有一群人有那么一种信念，也坚持了下来。可后来以党治国体制等等渐渐变了味，发现只要说自己有共产主义的信仰就能得到好处，就能升官发财。甚至一个政党弄到连总书记都是骗子，岂有不瓦解、不亡政之理？党的大小官员通过贪污受贿、权力寻租、变卖国有资产等手段把人民财产转移到个人腰包，共产党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先锋模范作用荡然无存。形成了“享受在前，利益全沾”的“新贵族”。一旦入党成了升官发财的途径，这个党就离灭亡不远了。看看就在

苏共瓦解的 1989 年，苏联社会科学院发出调查问卷，收回的还是这样一组数据：“苏共究竟代表谁？”答案：认为代表劳动人民的 7%；认为代表工人的 4%；认为代表官僚的 85%。这说明苏共根本就不代表苏联人民，只是官僚们的代表。苏联不是人民的苏联，主权也不在苏联人民手里。

到了 1980 年代中期，国内问题堆积如山。长期实行高度集权的“以党治国”的政治体制，官僚—精英阶层垄断了政权、财富和真理，人民群众被排除在决策体系之外，“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徒有虚名。苏联领导人却思想僵化、墨守成规，表面文章达到令人头昏目眩的程度，看不到眼前的万丈深渊。利益集团盘根错节、利益固化、骄奢淫逸，官僚机构人满为患，人浮于事；社会缺乏公平公正、贪腐横行、官不像官，民不像民，贫富悬殊，人心向背、乱象丛生、官民对立。社会缺乏共识和凝聚力，道德失守，价值失落、人心涣散等问题严重。政令不通、公权力失控、社会失序，管理混乱、群体事件频发等等。此时的苏联是个经济发展缓慢、官僚主义盛行、特权与腐败大行其道、秘密警察无所不在、没有法治、没有民主、没有自由、没有人权的专制国家。苏联政治危机已逐渐地显露出来，社会逐渐陷入混乱和脱序，最终导致维持社会秩序基础崩溃，处于强制和反强制的不稳定混沌状态。

从 1982 年到 1984 年，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苏共连续三任年老病弱的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相继在职病逝，最终陷入“人没亡政就息了”，整个国家和社会陷入了空前沮丧和对前途的迷惘之中。留下一个已经病入膏肓的苏维埃政权，盛极而衰的苏联给戈尔巴乔夫。此时的社会已处于强制和反强制的不稳定混沌状态，长期积累各种社会矛盾可能因偶然事件爆发而进入动荡。

戈尔巴乔夫就是在这种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的状态下走向领导岗位的。可以说，除了民族问题之外，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存在的其他危机看得比较清楚。不改革只有等死，只有义无反顾地投入改革，国家和党才会有的一线生机。但已经来不及了，苏联人民这时已发出“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的怒吼声，危机已全面露出。改革已经晚了，任谁都无法改变苏联解体、苏共亡政的命运。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当宣布苏共解散时，全国近 2000 万党员、2600 万团员、2 亿工会会员，几乎无人抗议和救护，甚至苏共人员离开苏共中央办公大楼时，有成千上万的苏联老百姓包括原苏共党员赶来看热闹，向撤离的苏共干部起哄、吐唾沫，最后为人民所抛弃。也就是说，系统长期缺乏内外互相制衡，缺乏竞争，权力和权利不能制约，失去监督的权力不可能不腐败。有生无克，物极必反，由好变坏；缺乏内、外的物质、信息、能量的动态交流沟通，系统就会转化为封闭系统或半封闭系统；系统新陈代谢出现异化，致使自我调节、自我修复的免疫力功能衰竭，缺乏活力进入老化状态，从而难以维持系统的正常运转，逐渐衰弱瓦解，盛极而衰。社会就会处于强制和反强制的不稳定混沌状态。最终，出现混沌理论“蝴蝶效应”（在巴西一只蝴蝶翅膀的拍打能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产生一个龙卷风“蝴蝶效应”），叶利钦振臂一呼，庞大苏联帝国顷刻解体，不稳定的封闭系统自动瓦解，转化为新的系统状态。

由此可见，苏共亡政关键原因是迷信“胜者王败者寇”丛林法则的马列唯物斗争哲学，抛弃民主宪政，建立“以党治国”体制。由于缺乏相互制约、相互竞争的政党，苏共缺乏忧患意识，缺乏自我更新和改革，以停滞改革求稳定，走上腐败变质道路。苏共亡政是几十年来问题不断积累下来的、潜伏着的社会矛盾恶性发展和总爆发的必然结果。

注：资料来自互联网

有感一：改革成功不一定有效

有感二：中国改革路在何方？

有感三：中国危机的根源是什么？

有感四：没有传统文化，改革注定失败

有感四-2：儒家思想到底是好是坏？回复网友对《没有传统文化，改革注定失败》一文质疑有感



有感五：唯物辩证法错在那里？

有感六：改革理论危机如何突破？

有感七：“制度论”错在那里？

有感八：“改革如何做到“不折腾”

来源：共识网 | 来源日期：2013-05-06 | 责任编辑：王梦瑶